



## 第2篇

# 《十二遊經》版本及譯者考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 摘要

從西晉到南朝，中國佛教界共譯出《十二遊經》三次，但是最後只留下了一個譯本，並被收入到大藏經裡。三譯本或譯者有二個與廣州有關，《十二遊經》很可能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佛教有關，其底本有可能是取自南傳上座部的巴利語系本。三譯本現在只剩下迦留陀伽法師譯本收入到大藏經裡，說明迦留陀伽法師在當時還是有一定影響。《十二遊經》被許多經典引用，一直受到法師們的關注，其中不乏著名的道安、僧祐、費長房、智升、道宣、志磐等一代大家，說明這部小經起到「跡均俗典」的功用，提供了很多為人不知或者不同說法的知識，開拓了人們眼界，特別是作為介紹「瞿曇姓源」的著述，經中的說法補了佛經不足，也提供了新材料。

**關鍵字：**十二遊經 譯經 佛傳 海上絲路

西晉到劉宋 300 年，中國佛教界發生轟轟動動的大規模文化引進的譯經活動，許多知名或不知名僧人參與其中，梁代高僧慧皎就指出：「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一。」<sup>1</sup>一部經典出現不同版本，《十二遊經》的翻譯就是一種。本文試圖釐清此經不同譯本情況，並就其內容做一介紹。

## 一、《十二遊經》三個版本與譯者

《佛說十二遊經》為「十二遊經一卷六紙」，<sup>2</sup>計 2800 字，南朝僧祐法師《出三藏記集》卷 4 云：

十二遊經一卷（舊錄云二由經）

十二遊經一卷（異本大同小異）<sup>3</sup>

此為歷史上最早記載《十二遊經》記錄。僧祐律師是我國齊梁時代的律學大師，也是古代傑出的佛教文史學家，除了在律學方面尤有建樹外，還在中國佛教文史方面做出成績，是歷史上第一個「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sup>4</sup>的佛教文化大師。他編纂的《出三藏記集》15 卷，為中國現存最古的佛教經錄，《十二遊經》就被錄入其中。僧祐編經錄，參考了很多舊錄，特別是對道安法師的《綜理眾經目錄》引錄很多，也包括其他「新集所得，今並有其本，悉在經藏」<sup>5</sup>的經錄。僧祐說《十二遊經》為舊錄所錄，

1. 《高僧傳》卷 3，CBETA 2019.Q2, T50, no. 2059, p. 345c13-15。

2. 《開元釋教錄》卷 20，CBETA 2019.Q4, T55, no. 2154, p. 696c10。

3. CBETA 2019.Q2, T55, no. 2145, p. 30b10-11。

4. 《高僧傳》卷 11，CBETA 2019.Q2, T50, no. 2059, p. 402c16-17。

5. 《出三藏記集》卷 4，CBETA 2019.Q2, T55, no. 2145, p. 32a1-2。

但他沒有指出為哪本經錄所錄，十分可惜。他又指出此經「異本大同小異」，說明他見過這部經文的其他譯本，比較過它們的不同，但是沒有記錄二個譯本的譯者，也殊為可惜。這個問題在其後不久的隋代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中有了新的說法。

### 1、彊梁婁至譯本

《歷代三寶紀》載：

《十二遊經》一卷。

右一經一卷。

武帝世外國沙門彊梁婁至，晉言真喜，太始二年於廣州譯，見始興及寶唱錄。」<sup>6</sup>

西元 266 年，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禪位，取司馬家族封為晉王的稱號，定國號為晉，國都洛陽，年號「泰始」。前涼沖王張玄靚沿用晉潛帝年號「建興」，叫作「太始」（355-360）；沿用晉穆帝年號「升平」，或作太始（361-363）。另說張玄靚在位時，對外先用建興年號，後改用升平年號，對內則使用太始年號。南朝宋明帝劉彧立泰始（465-471）年號共 7 年。

「太始二年」應是「泰始二年」，西元 266 年。《始興錄》是南齊人在廣東省韶州（今韶關）編的經錄，因多記南方所譯經論，也名《南錄》。《寶唱錄》是梁武帝於天監十七年（518）敕僧人寶唱重撰的經錄，這二部經錄都記載了《十二遊經》的名字。

從魏晉到隋朝，「其間京邑將若蝟毛，鷄蹲鶴立之都二十有二國。其一吳三秦涼魏齊陳等，此之八國雖曰各保名器，並皆宣譯佛

6. 《歷代三寶紀》卷 6，CBETA 2019.Q4, T49, no. 2034, pp. 64c15-65a11。

經，能使三寶住持，則是四生蒙賴，所以務善者流慶，故致世錄相沿焉。而紀目無聞乘，時霸王者十有四國既不闡揚聖教，於事莫知祖修」，<sup>7</sup>可知魏晉南北朝期間，前後一共有22個國家存在過，其中8國一直從事譯經弘法的活動，其他14國「不闡揚聖教」。但費長房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是22個國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佛教，例如南朝梁代，在菩薩皇



梁武帝是信佛虔誠的「菩薩皇帝」

帝梁武帝努力下，佛教成為事實上的國教，地位很高。特別是他曾經六次捨身出家入寺，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西域僧人佛圖澄到北朝洛陽，志弘大法，在後趙石勒支持下，推廣佛教信仰。佛圖澄勸石勒之子石虎：「帝王之事佛，當在心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sup>8</sup>石虎聽信佛圖澄勸誡，「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sup>9</sup>開漢人出家風尚。從東漢到南北朝，正是中國佛教傳入的上升期，佛教文化在南北兩地競擇熱烈，譯經活動如炎如荼。

《十二遊經》的譯者彊梁婁至在歷史上記載不多，只有《歷代三寶紀》裡有一點敘述，其他都是從這裡引出。唐代靖邁編纂的《古今譯經圖紀》卷2說彊梁婁至是西域人，「以晉武帝太康二年

7. 《歷代三寶紀》卷3，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34b6-c3。

8. 《高僧傳》卷9，CBETA 2019.Q2, T50, no. 2059, p. 385a29-b7。

9. 《高僧傳》卷9，CBETA 2019.Q2, T50, no. 2059, p. 385b27-28。

歲次辛丑，於廣州譯《十二遊經》（1卷）」。<sup>10</sup>《古今譯經圖紀》4卷是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敕令大慈恩寺於翻經堂內壁描繪「古今譯經圖變」，將該圖作成畫卷，靖邁擔任玄奘的筆受者，將畫上記載各譯師小傳與所譯經典，變成圖紀。《古今譯經圖紀》說《十二遊經》譯於西晉「太康二年」，不知根據來自何處？「太康二年」為西元282年，與《歷代三寶紀》所說的「泰始二年」相差16年。二本經錄皆強調《十二遊經》第一譯都是在廣州譯出的，作者相同，地點無誤，只是譯經年代上有些區別。但到宋代智磐編纂的《佛祖統紀》卷36「泰始二年」條則稱：「西竺沙門婁至，來廣州譯十二遊經。」<sup>11</sup>「西域」與「西竺」相差甚遠，前者是指中國漢代嘉裕關之外的新疆與中亞地區，後者是指西印度，一字之差，謬之千里。

社會動盪時期，也是佛教發展時代，整個社會與朝野上下對佛教充滿虔信，佛教發揮著特殊的治心功能，撫慰著每個人的心靈。涼州是北方絲綢之路譯經中心，竺法護和彊梁婁至都在此從事譯經活動。《歷代三寶紀》說：

月支國沙門曇摩羅察，晉言法護，本姓支。歷遊西域，解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大齋梵本婆羅門經，來達玉門，因居燉煌，遂稱竺氏，後到洛陽及往江左。起（晉）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懷帝世永嘉二年，其間在所遇緣便譯經，信士聶承遠執筆助翻，卷軸最多。<sup>12</sup>

10. 《古今譯經圖紀》卷2，CBETA 2019.Q4, T55, no. 2151, p. 354a26-28。

11. CBETA 2019.Q2, T49, no. 2035, p. 338c14。

12. 此處載竺法護譯經計210部，合394卷。

竺法護是中國佛教史上的著名譯經家，被稱為「敦煌菩薩」。「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以晉文所獲。……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sup>13</sup> 慧皎《出三藏記集》說竺法護譯出佛經「凡一百四十九部」，<sup>14</sup> 費長房說「（西晉）沙門竺法護 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經戒）。沙門彊梁婁至 一部（一卷經）」，<sup>15</sup> 二人對法護譯經總數出入較大，幾乎相差近一小半，但是這並不能減損法護對中國佛教文化的貢獻。將法護與彊梁婁至列在一起，則有些深意，雖然彊梁婁至只譯出了一部《十二遊經》，比不上《法華經》《華嚴經》《般若經》《解深密經》之宗經重要，但是《十二遊經》在當時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則慧皎不會發出「復恨」重為翻譯今古二經的感歎。

## 2、迦留陀伽譯本

《歷代三寶紀》又說：

十二遊經一卷（第二出，與彊梁譯者小異。）

右一卷。孝武帝世外國沙門迦留陀伽，晉言時永<sup>16</sup>，太元十七年譯，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寶唱錄。<sup>17</sup>

「第二出」是指第二個譯本。「與彊梁譯者小異」，是說內容與第一個譯本小異（稍有不同）。可知此經有二譯。「太元十七年」（392）是東晉孝武帝執政的時候，與《十二遊經》第一譯相差 122

13. 《出三藏記集》卷 13，CBETA 2019.Q4, T55, no. 2145, pp. 97c19-98b2。

14. 《出三藏記集》卷 13，CBETA 2019.Q4, T55, no. 2145, p.98a2。

15. 《歷代三寶紀》卷 6，CBETA 2019.Q4, T49, no. 2034, p. 61c12

16. 《開元釋教錄》卷 3 稱「沙門迦留陀伽，晉言時水，西域人」。

17. 《歷代三寶紀》卷 7，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70b27-c2。



年。第二譯譯者迦留陀伽，漢譯為時永。晉代釋道流撰《魏世經錄目》《吳世經錄目》《晉世雜錄》《河西偽錄》4部，但未成而卒，同學竺道祖繼續完成，故稱為「竺道祖晉世雜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斷代經錄開始。

《歷代三寶記》裡第一次出現了《十二遊經》的第一譯者是「彊梁婁至，晉言真喜」和第二譯的譯者是「迦留陀伽」，非常重要，是對《出三藏記集》譯者情況作了補充，但是對二位作者的生平事蹟沒有介紹，殊為可惜。與《歷代三寶記》比較，唐代智升編纂的《開元釋教錄》卷3說：

十二遊經一卷（第二出，與彊梁譯者少異，見竺道祖晉世雜錄及寶唱錄）

右一部一卷，其本見在。

沙門迦留陀伽，晉言時水，西域人。弘喻有方，懷道遊國，以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壬辰，譯十二遊經一部。<sup>18</sup>

《開元釋教錄》保留了《歷代三寶記》的說法，也增添了新內容，指出迦留陀伽是西域人，以「時水」為漢譯作者名。「永」比「水」頭上多一點，字跡相近，疑被混用。從文義上看，筆者以為「永」字義近原意。《開元釋教錄》還強調了迦留陀伽在弘教方面的貢獻，以及後來回到西域的情況，這些都是在唐代經錄裡才有的新說法。<sup>19</sup>更重要的是講到第二出《十二遊經》「其本見在」，說明彊梁婁至的譯本已經見不到了，到唐代只剩下迦留陀伽的第二譯本，以「佛說十二遊經 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sup>20</sup>的形式而收入大藏經。遺

18. 《開元釋教錄》卷3，CBETA 2019.Q4, T55, no. 2154, p. 505b11-15。

19. 唐代靖邁的《古今譯經圖紀》也持「西域人」的說法。

20. 《佛說十二遊經》，CBETA 2019.Q2, T04, no. 195, p. 146a3-5。

憾的是費長房與智升雖然明確有第二譯本存在，但是仍然沒有講出譯經地點，給歷史留下遺憾。

《開元釋教錄》卷3說：

沙門迦留陀伽（一部一卷，賢聖集）<sup>21</sup>

「佛法東行，年代已遠，梵經西至流布漸多，舊來正典並由翻出，近遭亂世頗失原起，前寫後譯質文不同，一經數本增減亦異，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採要事更立別名，或輒構餘辭仍取真號，或論作經稱，疏為論目，大小交雜是非共混，流濫不歸因循未定，將恐陵遲聖說，動壞信心，義闕紹隆，理乖付囑。」<sup>22</sup> 中國佛教譯經自漢魏到隋朝已經達到了一定規模，參與譯經的中外人士，計「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經律戒論傳。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sup>23</sup> 眾多的經典在經錄中分為經、律、論和西梵賢聖集傳<sup>24</sup> 四大類，其中「賢聖集」是將漢地以外的外來僧人所撰寫的佛教典籍編成一類，通過「賢聖所撰，翻譯有原」的形式<sup>25</sup> 找到源頭。也有採用「披檢法藏詳定經錄，隨類區辯總為五分：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偽第五」<sup>26</sup> 的另外一種形式分類。

21. CBETA 2019.Q2, T55, no. 2154, p. 502c18。

22.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眾經目錄》卷1，CBETA 2019.Q2, T55, no. 2147, p. 150a21-27。

23. 《歷代三寶紀》卷15，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p. 120c21-121a6。

24. 《大唐內典錄》卷7，CBETA 2019.Q2, T55, no. 2149, p. 296c1-4。

25.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眾經目錄》卷1，CBETA 2019.Q2, T55, no. 2147, p. 150b16-20。

26.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眾經目錄》卷1，CBETA 2019.Q2, T55, no. 2147, p. 150a18-b9。



「賢聖集」是中國佛教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出現的編纂經錄分類形式，隋代則是這一階段開始，編纂「賢聖集傳」經典「四十一部一百六十四卷」，<sup>27</sup>《十二遊經》就列在其中。<sup>28</sup>到唐代靜泰法師編纂《賢聖集傳》時，又收錄經典「合五十部一百八十六卷（二千七百八十九紙）」。<sup>29</sup>中國文化重視祖宗信仰，尊重前賢，這個傳統被中國佛教接受。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佛教徒視印度為西天佛國，印度祖師及其他們的事蹟和所撰經典都被收入到《賢聖集傳》裡，又被編入大藏經，經千年而不失，被保存下來。《十二遊經》就是因為被收入到《賢聖集傳》流傳到今天。

釋靜泰撰《眾經目錄》卷2說《十二遊經》是「一卷（五紙）」，<sup>30</sup>《開元釋教錄》卷20說「十遊經一卷六紙」，<sup>31</sup>兩部經錄明確表明《十二遊經》的規模與大概字數。唐代經錄不僅經典數目增加，而且每一部經的用紙數也被標示出來。唐代抄經用紙有二種，一種是河南輝縣固圍村東二里的周代共伯和故居生產的「共城紙」，另一種是山西生產的「蒲州紙」，二者每張尺寸可容納字數不同，如《分別善惡所起經》1卷（共城十八紙，蒲州十五紙）。<sup>32</sup>共城紙比蒲州紙尺寸稍小，大致使用八張共城紙時，蒲州紙是七張。《十二遊經》使用什麼紙，現在無法核對。現存的《十二遊經》約三千字，使用了五張紙，每頁約六百字。按《出三藏記集》說兩種譯本「異

27. 隋·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撰：《眾經目錄》卷1，CBETA 2019.Q2, T55, no. 2147, p. 150b16-20)。

28. 唐·釋靜泰撰：《眾經目錄》卷2，CBETA 2019.Q2, T55, no. 2147, p. 161b3-c28。

29. 唐·釋靜泰撰：《眾經目錄》卷2，CBETA 2019.Q2, T55, no. 2148, p. 181b13-17。

30. 唐·釋靜泰撰：《眾經目錄》卷2，CBETA 2019.Q2, T55, no. 2148, p.196b16。

31. 《開元釋教錄》卷20，CBETA 2019.Q4, T55, no. 2154, p. 696c10。

32. CBETA, A098, no. 1276, p. 435, b5-p. 436, a4。

本大同小異」，看來兩種譯本文字相差不大，很可能是同源版本，而且使用了不同紙張。

### 3、求那跋陀羅譯本

值得注意的是，《開元釋教錄》又加一個第三譯：

十二遊經一卷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譯）。<sup>33</sup>

求那跋陀羅，齊言功德賢，中天竺人。另說「於闐國三藏」。<sup>34</sup> 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亦名摩訶乘。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醫方呪術、靡不博貫，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跋陀羅到師子諸國傳送資供，有緣東方，隨舶泛海，於元嘉十二年（436）至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文帝，朝廷遣使迎接。跋陀羅到金陵（今南京）住祇洹寺，受到宋文帝延請崇敬，譯出眾多經典，泰始四年（270）正月圓寂，春秋七十有五。<sup>35</sup> 這裡的「泰始」應是「太始」，為南朝宋第七位皇帝明帝劉彧（439-472）年號。



求那跋陀羅尊者概述圖

（取自百度百科）

33. 《開元釋教錄》卷 15，CBETA 2019.Q4, T55, no. 2154, p. 650a24-28

34.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CBETA 2019.Q2, T14, no. 497, p. 761c3。

35. 《出三藏記集》卷 14，CBETA, T55, no. 2145, p. 105, b17-p. 106, b21。

南朝宋代太始年間也是佛教文化發展的小高峰，宋明帝關心佛教文化發展，注意收集佛教經典整理。金陵作為南朝國都曾經成為朝廷譯經中心，集中了南方地區的高僧參與譯經。宋明帝信佛虔誠，「嘗造佛丈六金像，且食常齋，日誦般若，爰感舍利，造弘普寺（六帖）。」<sup>36</sup> 泰始元年，詔於金陵建陽門置興皇寺，勅沙門道猛為綱領，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二年，寶誌大士以剪尺鏡、拂掛杖頭負之而行，視為觀音化身。<sup>37</sup> 三年，明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sup>38</sup> 築崇虛館以禮致道士陸修靜。逸士顧歡作《夷夏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司徒袁粲託沙門通公，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sup>39</sup>

「南朝人士偏於談理，故常見三教調和之說。」<sup>40</sup> 求那跋陀羅在劉宋元嘉二十年譯出《楞伽經》，<sup>41</sup> 是南朝佛學活躍結果，此經成為禪宗的根本經典，對中國佛教思想史起到過推動作用。求那跋陀羅的豐富學識和筆受慧觀的中國文學素養之強強聯合，使《楞伽經》的譯出達到上乘水準，成為眾多譯本中的精品，代表了中外佛教學術強強聯合的最高水準的譯本，後來入華的菩提達摩大師選擇此經作為禪宗的根本經典，是有依據的。然而，歷史上這麼有名且

36. 《釋氏稽古略》卷2，CBETA 2019.Q2, T49, no. 2037, p. 792c18-19。

37. 《佛祖統紀》卷53，CBETA 2019.Q2, T49, no. 2035, p. 462a23-24。

38. 《佛祖統紀》卷54，CBETA 2019.Q2, T49, no. 2035, p. 471c21。

39. 《佛祖統紀》卷36，CBETA 2019.Q2, T49, no. 2035, p. 346a21-c1。

4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頁233。

41. 《歷代三寶紀》卷10云：「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元嘉二十年。於道場寺譯。慧觀筆受。見道慧、僧佑、法上等錄）。」（CBETA 2021.Q3, T49, no. 2034, p.91a26-27）

學識滿腹的譯經僧，又生活在中國佛教史上佛教活動最盛的南朝與譯經盛時的求那跋陀羅法師，其翻譯的《十二遊經》卻沒有流傳下來，實在是太可惜了。

## 二、《十二遊經》內容分析

梁代僧祐曾經撰述了《釋迦譜》的著作，內容為「泥洹塔像之微，遺法將滅之相，總眾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顯然這是一本抄錄與釋迦牟尼生平事蹟有關的著作。學術界認為佛陀的生平事蹟，在大藏經裡有《阿含經》《佛所行讚》《佛本行集經》《釋迦譜》《佛說眾許摩訶帝經》《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以及一些律本，包括一些抄經都有所記載，主要來自於陸路絲綢之路的底本與譯經。《十二遊經》與佛傳有關，但是並沒有被計入其內，學者認為此書應是古印度部派佛教曇無德部（即說一切有部）編纂的，地點在烏仗那（今中亞一帶）。

佛教經律論中，經是釋迦牟尼所說，<sup>42</sup>每部經前面都有「如是我聞」或「聞如是」幾字，表示這部經文是我曾經聽佛說過的意思。僧祐說：

十二遊經，不稱我聞，復無佛言，蓋是羅漢注記之說也。尋瞿曇氏族，乃緣起宿世，越至賢劫，還即本姓，業因深遠，不可思議也。其所述轉輪，略而不同，世數之緒，難得推按，然瞿曇姓源，頗為詳悉，故撰之云。<sup>43</sup>

42. 但是禪宗的《壇經》除外。

43. 《釋迦譜》卷1，CBETA2019.Q2,T50,no.2040,p.3c17-21。

《十二遊經》沒有「如是我聞」幾字，因之僧祐認為這部經典應是羅漢所說，不是佛說的經典。其次，僧祐又指出瞿曇氏族即釋迦族歷史久遠，該族傳說的轉輪王事蹟很難考證，但是關於瞿曇姓源記載，則還是很詳細的，《十二遊經》就是記載釋迦族聖人與家族事蹟的經典。元代《大藏聖教法寶標目》卷8云：

佛說十二遊經

右說佛降生成道。十二年中，於十六大國等處行化度人。<sup>44</sup>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指出《十二遊經》佛降生成道故事，其情節與我們所了解的其他佛傳經典有差異。《十二遊經》說往昔阿僧祇劫時，一位菩薩國王將王位讓給弟弟，自己捨國出行求道。在瞿曇婆羅門指導下，菩薩改姓瞿曇，<sup>45</sup>入深山林藪坐禪，後回國在城外甘果園<sup>46</sup>中獨坐。此時國人已經認不出來菩薩面目，視他為小瞿曇。一天，國中官物被竊，贓物扔在小瞿曇住房邊上，國王下令將小瞿曇正法。婆羅門瞿曇出面收屍，移棺斂之，又取土將小瞿

44. CBETA 2019.Q2,L143,no.1608,p.675b13-15。

45. 《釋迦氏譜·序氏族根源》云：「唐言瞿曇者，星名也，如此張氏因星立姓故。涅槃經云，禰瞿曇姓自古相傳。言瞿曇者，此云泥土也。但是譯人取語輕重，今問梵僧言瞿茶者泥土也，求曇者是星名也，故知因星得姓定非泥土。」（CBETA 2019.Q2, T50, no. 2041, p. 85a15-19）

46. 《釋迦氏譜·序氏族根源》云：「言甘蔗者，即如彼經，菩薩往於甘蔗園中，遊止修道，因園命氏。又名甘蔗故。佛所行讚云：甘蔗之苗裔者是也。」（CBETA 2019.Q2, T50, no. 2041, p. 85a19-22）言舍夷者，如四分律云：佛舍夷種，亦云舍夷國，未審此名。言釋迦者，長阿含云，過去有王名曰懿摩（即第十輪王去菩薩身一百世也），擯斥四子（第四子名莊嚴，即白淨王所承）令遠出國，奉王命已到北雪山，住直林中。」（CBETA 2019.Q2, T50, no. 2041, p. 85a1-b2）



曇的血攪團，放在左右器皿中，<sup>47</sup> 十月以後，左器皿成男，取名瞿曇；右器皿出女，取名舍夷仁。<sup>48</sup> 後來進入賢劫期，壽命超過五百萬歲的是寶如來釋迦轉輪王，其後二十五位國王，每人壽命三百萬歲，往後的文陀竭王壽命百萬歲，到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髀王壽命十萬歲，歡喜王以後，壽命八萬四千歲。之後，遮迦越王殺牛祠祀，害命失金輪，得銀輪主三天下，壽命萬歲；堅念王作鎧甲，壽命五千歲，得銅輪主西南二天下；喜殺王壽命二千五百歲，得鐵輪主南天下。王太子行五惡，減壽千歲。到師子念王，人壽轉減，壽命一百二十歲。師子意王後的八十四王，壽命只有八十、七十、五十、三十、二十、十歲者，最後到菩薩父親迦惟羅閱國師子命車王，亦名白淨王，已經經歷了八萬四千遮迦越王。這是瞿曇氏純熟之姓的時代。

迦惟羅閱國白淨王有二子。菩薩投胎白淨王夫人摩耶，擁有一百萬戶國的一億王女兒，姓瞿曇氏，在四月八日生下太子悉達。悉達長大，身長丈六尺；妃子瞿曇彌四月九日生下次子難陀，身長丈五四寸。白淨王兄弟四人。大弟甘露淨王，亦有二子，長子調達，四月七日出生，身長丈五四寸；次子阿難，四月十日生，身長丈五三寸。二弟穀淨王，長子名釋摩納，次子阿那律。三弟設淨王，長子名釋迦王，次子名釋少王。迦惟羅閱國有八城，合有九百萬戶。太子悉達共有三夫人，瞿夷是第一夫人。耶惟檀是第二夫人，生子羅雲。第三夫人名鹿野。

47. 《釋迦氏譜·序氏族根源》云：「於時菩薩於園念道，以宿業故為賊所得，貫在木上流血於地，大仙瞿曇天眼清淨，菩薩絕嗣後佛無由，從山飛來哀斂死屍，取土中血以泥團之，著兩器中還返所止。以神呪力滿足十月，左變為男右變為女，瞿曇仙氏遂復興焉。」（CBETA 2019.Q2, T50, no. 2041, p. 85a22-27）

48. 《釋迦氏譜·序氏族根源》云：「言舍夷者，如四分律云：佛舍夷種，亦云舍夷國，未審此名。」（CBETA 2019.Q2, T50, no. 2041, p. 85a27-28）



悉達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成佛。第一年，從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禪坐樹下一年。二年，於鹿野園中，為阿若拘隣、畢婆般等、迦者羅等十七人說法；復為大才長者及二才念優婆夷、正念尼捷、提和竭羅佛等四十二人說法。三年，為鬱、迦葉兄弟三人說法，滿千比丘。四年，於象頭山上為龍鬼神說法。五年，於竹園中為私呵味說法。五年末至舍衛，舍利弗作婆羅門，有百二十五弟子坐一樹下，佛為說四諦。六年，須達與太子祇陀共為佛作精舍，作十二佛圖寺、七十二講堂、三千六百間屋、五百樓閣。七年，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八年，在柳山為屯真陀羅

王弟說法。九年，穢澤中為陀崛摩說法。十年，還摩竭國為弗迦沙王說法。十一年，恐懼樹下為彌勒說本起。十二年，還父王國，於去城八十裡的釋氏精廬，為差摩竭、父王及釋迦種說法，度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道。此外，目連和舍利弗等二百五十人一起學佛，佛為他們說四諦法，舍利弗七日得阿羅漢，目連十五日得阿羅漢。《十二遊經》簡介了佛的家族來源，成道及說法的過程，以及佛在十二



佛陀畫冊，佛為五比丘說法

年裡遊歷十四國經歷，可知這部經典對了解佛的生平事蹟是有一定幫助的。

《十二遊經》一共 2800 字，介紹了釋迦族和釋迦佛故事，不如其他經典講述詳細，前後內容連續性不夠，僧祐說這部經典「其所述轉輪，略而不同，世數之緒，難得推按」。僧祐對這部經文的說法做過校對或比較，例如對菩薩出家改名瞿曇，回國住城外甘蔗園故事，僧祐說：「佛所行讚經云：甘蔗之苗裔，釋迦無勝王淨財德純備，故名曰淨飯。案淨飯遠祖乃是瞿曇之後身，以其前世居甘蔗園，故經稱甘蔗之苗裔也。」用其他佛傳的漢譯本參照《十二遊經》，可知有不同的地方，如小瞿曇被殺，大瞿曇撮土為堆，分別成男女的故事，僧祐說：「案小瞿曇血化為人，乃宿世之事也。至賢劫中當寶如來出世時，瞿曇神識始生此世界為王耳。釋迦越此王號也。竊謂寶如來即是賢劫七佛之一名，但譯胡為寶，故與七佛名異耳。」<sup>49</sup> 撮土為堆的古老神話故事，轉換為生命神識的出生，把神話變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表明佛陀傳說正在擺脫原始神話而進入神學的過程。「瞿曇神識」是寶如來主體，已經承認生命之輪迴，具有重要的神聖性。釋迦超越了世界轉輪王，提升釋迦族的權威地位，賦予其在教內的合法性。

又如經中所說的「到頂生王遮迦越……遮迦越王殺牛祠祀……亦名白淨王，經歷了八萬四千遮迦越王」文，僧祐指出：「遮迦越，齊言飛行皇帝，即轉輪王也。長阿含及曇無德律序轉輪世數甚明，……大方便經云白淨，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三世不作轉輪而作閻浮提王。」<sup>50</sup> 區分世界統治者轉輪王和國家統

49. 《釋迦譜》卷 1，CBETA 2019.Q2, T50, no. 2040, p. 3b13-17。

50. 《釋迦譜》卷 1，CBETA 2019.Q2, T50, no. 2040，p. 3c11-16。

治者閻浮提王（眾生居住的娑婆世界），這是轉折性認識，將統治世界的最高目標降低到統治國家或地區的目標，無疑對加強治理國家有重要幫助。

此外，《十二遊經》中有的內容連不上，例如經中說：「波斯匿王，晉言和悅；迦維羅越，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國；波羅奈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sup>51</sup> 這一段是講印度十六個大國之中的五個國家譯名，但是在經中與這幾個國家的聯繫不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經中提到「晉言」，符合「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的歷史記載，可能這部經典底本不完整，翻譯出來的內容也不完整、不連貫，或許這是一部眾經文字抄出的抄經，故僧祐認為此經「尋瞿曇氏族，乃緣起宿世，越至賢劫，還即本姓，業因深遠」，它可以起到不可思議的結果。

中國史學認為「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sup>52</sup> 對資料的出處，佛教界人士要求較嚴，最好能夠找到淵源，並且予以精測。《十二遊經》被收入藏經裡，在於「然瞿曇姓源，頗為詳悉」，其最重要之處是介紹了釋迦族來源與傳說，及其宗族社會架構，不足之處則是對釋迦族的一些細節沒有描述，故作為釋迦族傳記，僧祐認為「此記抄撮難尋，若依全經，宜以阿含為正」。<sup>53</sup> 如果底本品質不好，就譯不出完整的好譯本，該經內容不完整且其原本不連貫，體系上缺少邏輯性，看來現存的譯本也不是最好的，而另二個譯本的品质更不達標而被淘汰。

51. CBETA 2019.Q2, T04, no. 195, p.147b6-10。

52. 《宋書卷 82·周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100。

53. 《釋迦譜》卷 1，CBETA 2019.Q2, T50, no. 2040, p. 3c13。

### 三、《十二遊經》譯本與佛教中國化

劉宋朝文帝、孝武帝和明帝三朝對求那跋陀羅禮供彌盛，但是他的傳記沒有談到他在何時何地譯出《十二遊經》。依據他在南方生活經歷，我們只能猜測他是在南方地區譯出此經。《開元釋教錄》卷 15 云：

十二遊經一卷（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拾遺編入，第二譯、三譯二闕）<sup>54</sup>

這裡指出了迦留陀伽譯的版本因「拾遺」而有幸被收入了藏經裡，其他的「第二譯、三譯，二闕」。《開元釋教錄》卷 15 又指出：

十二遊經一卷 西晉西域沙門彊梁婁至譯（第一譯）  
十二遊經一卷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第三譯）  
右前後三譯一存，二闕。<sup>55</sup>

這裡明確指出了西晉西域沙門彊梁婁至是第一譯，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是第三譯，東晉迦留陀伽是第二譯。從西晉到東晉再到劉宋，其間經歷了 230 餘年，《十二遊經》的三個譯本，只剩下一個譯本。筆者猜測，彊梁婁至是早期來華的譯經僧，當時人們對印度佛教不十分了解，更無法判斷與掌握經文內容，因之《十二遊經》第一譯在廣州譯出後，無人可以作出評判。廣州雖是中國佛教譯經中心之一，但不是全國性的文化中心，許多有名僧人和著名譯師都是在廣州登陸後，再由朝廷接到金陵都城供養，故廣州譯出的經典影響是有限的，加之不久碰到西晉八王之亂，國家步入衰微，受戰亂影響，

54. 《開元釋教錄》卷 13，CBETA 2019.Q4, T55, no. 2154, p. 623a4。

55. 《開元釋教錄》卷 15，CBETA 2019.Q4, T55, no. 2154, p. 650a24-28。

第一譯在動亂中沒有被保存下來，可幸的是，這部譯本被記錄在「竺道祖晉世雜錄」裡，譯本與譯者的基本情況都被記錄下來。

第二譯也是戰火紛飛時代。北方戰爭影響到南方，道安在晉孝武帝時率領弟子到襄陽，分張徒眾，慧遠在廬山建立東林寺，對淨土宗產生深遠影響。雖然此時譯經活動一直不斷，但受戰爭影響，不如其他幾朝，受佛教初傳餘緒之影響，譯出的大乘經般若經是經抄，沒有完整譯本。但是中國佛教經錄學正在呈現發展，經典分類與編藏已經基本完備，「賢聖集」成為小經主要搜集目錄來源，加之東晉是中國純學術時代，佛教也搭乘這種風氣日益受到重視，《十二遊經》作為眾多小經之一被記錄入藏，譯本也被收到大藏之中。

東晉、後秦時期，分別以長安鳩摩羅什、廬山慧遠、建康佛陀跋陀羅為中心，形成南北地區最主要之三大僧團。之後，秦弘始十五年（東晉義熙九年，413）鳩摩羅什卒，東晉義熙十二年（416）慧遠卒，長安佛教趨於消歇，廬山佛教亦不免漸衰，建康乃隱然成為當時中國佛教之中心。南朝各朝代信仰佛教，設立譯館，接納外來僧人，推動佛教文化活動。劉宋相承八主 59 年，譯經、撰述和編目同時並舉，「諸譯人華戎道俗二十有三，合出修多羅、毘尼戒本、羯磨優波提舍、阿毘曇論、傳錄等，凡二百一十部四百九十卷」，<sup>56</sup> 而《十二遊經》第三譯主求那跋陀羅譯經 78 部（161 卷經集喻），約占整個譯經總數三分之一，其譯出的《雜阿含經》是小乘四阿含經典中最重要、最完整的一部。《勝鬘楞伽經》《央掘魔羅經》是佛教如來藏經典，《無量壽經》是淨土宗經典，《般泥洹

56. 《歷代三寶紀》卷 10，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89a8-11。



經》是涅槃學的根本經典。此外，他還譯出介紹印度外道見解的《釋六十二見經》，可惜此經最終沒有被保存下來。《十二遊經》與其他經典相比，雖然有其特殊妙用，但是部頭太小，加之屬於小乘經典，沒有傳世也屬可以理解。

以上三個譯本有二個譯本是在南方譯出。彊梁婁至和求那跋陀羅都在廣東住過，求那跋陀羅坐船來到中國的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驅之一。廣州是南方譯經中心之一，據僧錄與僧傳記載，晉代曾在這裡譯出多部佛經，如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經 20 餘部，其中《阿述達菩薩經》1 卷是此經第三譯，「與晉世竺法護再出者大同」。<sup>57</sup> 罽賓三藏法師曇摩耶舍於晉隆安年由長安抵廣州白沙寺，譯《差摩經》1 卷，此經「為清信女張普明譯（此應入晉世，隨人附秦）」。<sup>58</sup> 南齊建元三年，天竺沙門曇摩伽陀耶舍於廣州朝亭寺譯出《無量義經》1 卷，傳受人沙門慧表「永明三年齋至揚都，繕寫流布」。<sup>59</sup> 宋武帝時，外國沙門摩訶乘於廣州譯出《五百本生經》及《他毘利律》2 卷，<sup>60</sup> 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

57. 《出三藏記集》卷 2 云：「海意經七卷（闕）、如來恩智不思議經五卷（闕）、寶頂經五卷（闕）、無盡意經十卷（闕）、三密底耶經一卷（漢言賢人用律闕）。右五部，凡二十八卷。宋明帝時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出，並未至京都。」（CBETA 2019.Q2, T55, no. 2145, p. 13a27-b5）《歷代三寶紀》卷 10 云：「無盡意經十卷、海意經七卷、如來恩智不思議經五卷、寶頂經五卷、阿述達菩薩經一卷……三密底耶經一卷（亦云賢人明律經）右六部合二十九卷。（宋）明皇帝世，天竺沙門竺法眷於廣州譯，見始興僧祐出三藏記及寶唱等三錄。」（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93c18-24）《歷代三寶紀》卷 10，CBETA 2019.Q4, T49, no. 2034, p. 93c21。《歷代三寶紀》卷 6 云：「阿闍貴女經一卷（建武元年出，第二譯，與吳世支謙譯者小異，亦名阿述達經亦名。阿闍世王女經，亦名阿述達菩薩經，見聶道真及支敏度錄）。」（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64b10-11）。

58. 《歷代三寶紀》卷 8，CBETA 2019.Q4, T49, no. 2034, p. 77b10。

59. 《歷代三寶紀》卷 11，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95b9-13。

60. 《歷代三寶紀》卷 11，CBETA 2019.Q2, T49, no. 2034, p. 95b9-17。



見《毘婆娑律》18卷（見道慧《宋齊錄》及《三藏記》）。<sup>61</sup>

彊梁婁至在廣州譯出《十二遊經》的情況已在經錄中揭載，說明此經第一譯與南方地區關係甚密。第二譯者迦留陀伽履歷不清楚，不知是在南方或北方譯經。第三譯者求那跋陀羅雖在廣州和南方地區長住，也不知在哪裡譯出這部經典，但是廣州作為中國佛教南方文化中心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點，又是著名大都市，能在這裡譯經是對來華外國僧人的重要考試，或許在這裡經過考驗的僧人，才有機會被送入都城金陵去接受皇帝的謁拜或供養。

彊梁婁至和迦留陀伽在中國都是只譯出一部《十二遊經》的外來僧人，藏經中收迦留陀伽譯本，說明迦留陀伽的譯經品質是可以的，而受到人們的承認與重視。經錄裡說他「弘喻有方，懷道遊國」，表明他到中國的目的是弘法，以遊行僧為至期，但他譯出《十二遊經》後就沒有紀錄，也許是回國了。求那跋陀羅譯經眾多，且譯經品質很好，與他配合譯經的人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與名僧，但是他譯的《十二遊經》卻沒有被收錄進藏經，按他在佛教界的威望，與所建立的人脈關係，其譯的經典不可能不入藏，但是事實卻是沒有入藏，僅僅被經錄記錄了，這些現象成為佛教經典史上的謎團，值得好好研究與深思。

雖然我們現在見不到更多材料，無法說明原因何在，但按照中國佛教譯經史規律，一經有多個譯本是很正常現象，許多著名經典都有好幾個不同版本，有的版本甚至出入很大。例如《心經》有7個版本，《金剛經》有9個版本。不同譯本表明外來經典原產地不同，故造成理解差異，包括譯者和整理者水準，也都會影響到譯本

61. 《歷代三寶紀》卷11，CBETA 2019.Q4, T49, no. 2034, p. 95b18-c17。

真實性與品質，因而造成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內部發生因譯經而引起的「格意」與「會本」的經典理解運動。

信眾學習挑選更好的譯本，作為學習材料，這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經典選擇本身就是中國化過程，挑選那些內容整齊、易於理解、有一定意義的譯本非常重要。許多重要譯本不是看重譯經者身分，而是根據譯文品質好壞而作出評判。迦留陀伽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不顯眼的人物，沒有什麼生平事蹟留給後人，一生只翻譯一本《十二遊經》，但在該經三個譯本中，只有迦留陀伽的譯本被保存在藏經裡面，至少說明他在當時還是有一定影響的，否則他譯的經典不可能被收入其中。



有的人發生困難，遭遇挫折，卻不去檢討原因，只在果報上計較，於是怨天尤人，忿恨不平。殊不知凡事有因有緣，才會有果，自己所受的果報，正是自己植下的因，所產生的結果。如能了此真理，就會甘心受報，坦然自在，縱使受苦，也只是今生。否則今生再造苦因，來世還要再受苦果，如此輪迴不已，生生世世受苦，終將永遠不得解脫。因此，了解佛教的緣起、業報、因果 a、無常、苦空等義理，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人生，了悟人生，進而掌握人生，開創人生。

——《佛教叢書·教用·佛教與人生》